

材料、取径与呈现

——关于环境史史料的几个问题

徐 波

(昆明学院 昆明科学发展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 环境史并非纯然的社会史, 因此, 它需要关切“天人之际”即社会—自然之互动, 也关注关于自然的各种材料。与史料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学术路向, 路向关涉视野, 进而关涉史料。基于此, 向其他学科的学习采借, 必不可少。占有材料是为了认识对象的原貌、全貌, 把握问题的核心、症结, 在既有研究和知识体系之外开出学术新天。这需要学识、见识、胆识。其中难得的是胆识——它不仅在于空所依傍, 见前所未见, 更在于敢为天下先, 言人所不能言。

关键词: 环境史; 材料; 取径; 呈现

中图分类号: K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5639 (2019) 01 - 0023 - 09

DOI: 10. 14091/j. cnki. kmxyxb. 2019. 01. 005

Materials, Approaches and Representation about Environmental History

XU Bo

(Institute of Kunming Scientific Development,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which is not pure social history, needs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and all kinds of natural materials. The other problem of it is academic approaches about visual field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earn from other disciplines. Studying materials is learning their original and intensive appearance, mastering their key points and creating new academic fields outside the research and knowledge system. However, learning, insight and courage are needed for all these, and coura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ince it is the ability of superior judgmen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history; materials; approaches; representation

环境史在材料的搜集、使用上, 有其独具的特点; 由于晚近时期社会变迁同自然环境日益剧烈的互动与碰撞, 环境史研究在取材的路向上, 在利用史料以追问环境递嬗背后的技术驱动、制度安排乃至价值理性等人类因素之类的问题上, 也颇有一些

值得深究之处。而作为一个较新的史学分支, 迄今关于环境史史料的专门研究甚少, 仅有不多的几篇论文对国内外环境史史料问题作了讨论, 学术上有很多待开拓空间。^① 以下拟就环境史材料的搜集、取径及呈现(史料的运用)等问题做一些探讨。

收稿日期: 2018 - 06 - 30

基金项目: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建设项目“云南社会/边疆及生态环境研究”(2015cx06)。

作者简介: 徐波(1955—), 男, 云南宣威人, 昆明学院二级教授, 云南师范大学兼任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环境史、边疆史研究。

^①梅雪芹的《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涉及了西方环境史的资料及研究方法的一些问题(如其中讨论了“《尘暴》的资料运用于环境史研究方法”、马克思关于英国环境问题的经典文献《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迄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问题展开研究的, 有以下论文: 陈全黎《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史料问题——以〈大象的退却〉为中心》(《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贾璐《试论从环境史的视角诠释高技术战争——研究价值与史料特点》(《学术研究》2007年第8期)、吴寰《中国环境史文献的分类问题初探》(《保山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一、竭泽而渔，穷搜极检： 基本材料的搜集

材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与史学的其他分支一样，环境史研究也需要以竭泽而渔的气概占有材料，穷搜极检，以奠定深入分析辨识的基石。而其他史学分支有所不同，环境史并不是纯然的社会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其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史研究。因此除了传统史料学的涉猎范围之外，还要关注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材料。这就使得环境史的材料范围和搜求难度、工作量大大增加。

(一) 传统史料学所列各类材料

中国作为史学大国，尤以传统史料为史学得以生发展开的基础。传统史料，汗牛充栋，目前仍然是史学入门的必由津梁。如梁启超把史料分为两种十二类：第一种是文字记录以外的史料，包括：现存的实迹，传述的口碑，遗下的古物，下分五类：一、现存之实迹及口碑。二、实迹之部分存留者。三、已淹没之史迹其全部意外发现者。四、原物之保存或再现者。五、实物之模型及图影。第二种是文字记录的史料。下分七类：一、旧史。二、关系史迹之文件。三、史部以外之群籍。四、类书及古逸书辑本。五、古逸书及古文件之再现。六、金石及其他镂文。七、外国人著述。^[1]又如荣孟源先生分为书报、文件、实物、口碑四类：书报分为历史记录、历史著作、文献汇编、史部以外的群籍。文件分为政府文件、团体文件和私人文件。实物分为生产工具、生活资料、武器和刑具、货币、度量衡器、印信、建筑、墓葬和古迹、模型和雕塑、照相和绘画、语言和文字、碑刻和砖瓦、纪念物。口碑分为回忆录、群众传说、调查记和文艺作品四类。^[2]类似的分类方法尚有很多。

具体到西部环境史研究领域，西北方面，如史念海在《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3]，熟稔地使用了大量先秦以来的传统史料；青年学者赵珍《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4]也参考或使用了很多的传统史料，包括地方志（90种）、官书政书档案碑刻之类（63种）、私人笔记游记文集（37种）。类似著作还有很多。西南方面如方国瑜曾著《滇池水域的变迁》一文^[5]，看似举重若轻，实系以

深厚的学养和史料功底为基础。《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上下）即其研究西南历史地理的名著^[6]，其内容除政治经济文化以外，也从多方面涉及天人关系。20世纪80年代后，许多著作涉及西南生态环境史，也主要基于传统史料。如于希贤《滇池地区历史地理》^[7]、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8]、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环境研究》^[9]、杨伟兵《云南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1659—1920）》^[10]、马国君《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11]等。其中如杨伟兵书中，即使用或参考正史政典奏稿谕旨档案及史料汇编类约40种、文集诗略笔记行纪杂史类约50种、方志之类约100种、年谱契据碑刻民族史传类约20种、专考工类约10种，等等。

不难看出，直至今日，传统史料是环境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当然，由于现代数字化手段的普及，今天研究者使用传统史料，其检索、存储、收藏、使用等的方便程度和效率，与上世纪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有了天渊之别。

(二) 关注人地关系相关材料

环境史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史，这是与传统史学研究不同之处，环境问题本质上是社会问题，因此，关注与人地关系相关的各种材料也成为题内应有之义。

1. 涉及大地景观、土地利用/覆盖的变迁的材料。譬如湿地、草地、森林、河流、沙漠、山地等的原初状况、变迁递嬗；微观—中观—宏观意义上的区域景观状况及其变嬗；又如人地互动，人类在其中的作用，表现为自然景观，到经过人力作用发生相应改变的次生景观，再到完全“人化”的景观，如工厂、车站、灯塔、码头、海港、市镇、城市、交通线（铁路公路）……此外，涉及与人类共同生存于大地之上的各种动植物，它们自身也随着大地景观、生态环境的变迁而经历或漫长或短暂、或剧烈或温和的变迁。文焕然先生的研究，深入地分析和展示了这种变迁。^{[12]3-298}

2. 反映人口变迁的材料。人口是人地关系之主动和活跃因素，研究环境史口史料和相关研究也就必然要成为一种重要关切。如梁方仲的名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3]，另如葛剑雄

主编《中国移民史》(一—六卷)^[14]、苍茗《云南边地移民史》^[15]、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16]等，均可以作为基本的参考和继续深入的指引。同时还需注意，作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载体，不同人群(农业人群，牧业/渔业人群，农牧混合人群，养殖人群，林业人群，矿业人群)代表着不同生计方式和相应的天人关系，其对于生态环境所发生的作用也大不相同。这也可作为一个新的议题，加以开拓。

3. 各种生计方式中，农业、工业/手工业、城市化是改变大地景观、土地利用/覆盖的主要形式和动力。包括农业技术递嬗(如农业生产工具/技术、水利、作物品种)，工业技术递嬗(如工业革命)，现代化导致的各种社会变迁(如从传统农业—石化农业，包括机械、化肥、农药、生物技术、大棚、地膜等的广泛使用等，又如“消费主义”导致的高度资源压力、生态环境压力)，等等。

就中国而言，直至改革开放时代之前，人类对于大地景观、生态环境影响或改变最重要的形式一直是农业开垦。因此，研究农业观念、农业制度政策、农业技术、水利利用、土地利用/覆盖等，研究农业、农民、农村、农场，必然成为环境史研究的一个重心。其中仅举一例，如引进作物，即是数百年间影响中国西部山地土地利用/覆盖和大地景观的重要因素，从而也成为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先后问世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17-26]

4. 人类制度设计、政治军事经济等组织形式变迁以及所谓路线方针政策的影响。这一领域大有拓展的空间。以现当代为例，如城乡二元制度、户籍制度、逆城市化道路、重工业化道路等发展路径等等，它们对于中国生态环境有什么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非常必要，^①其所涉及的每一个方面都可以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深入进去。

二、别具只眼，旁借他山：

学科的交叉与采借

与环境史史料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环境史

的学术路向问题。路向不同、取径不同，眼界也就不同，挖掘的范围、取材的指向和采择的宽厚度等等也就不同。不同时代有不同潮流，也就有不同的学术。因应时代潮流的学术，即陈寅恪所谓“预流”，否则即是“不入流”。更新的路向和取径，更高更宽的观察势位，意味着更新更多的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就此而言，学科的交叉、整合，学科间的相互借鉴学习——对于作为史学一支的环境史而言——尤其是向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学习采借，就成为一件必不可少的工作。

以下略举一些事例。

(一) 自然科学。地质学，生态学、气候学、物候学，杰出者如竺可桢的历史气候学、物候学研究，文焕然的历史植物/动物变迁史研究等^[12]，^[27-28]。广义上，这些研究也成为环境史的一部分。

(二) 历史地理学。如谭其骧、史念海、于希贤、兰勇、陆韧、王建革、杨伟兵、杨煜达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广义上也可列入环境史，同时他们的工作又都是以历史地理学为基础展开的。

(三) 民族学人类学。成果也不少。如尹绍亭教授1991年出版《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此后又相继出版了一批专著和《基诺族刀耕火种的民族生态学研究》等十几篇论文，颇有新见，同时还在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博物馆建设、物质文化研究与保护等几个领域都取得创造性的成果^②；又如杨庭硕先后出版《人类的根基》^[29]《民族、文化与生境》^[30]等，也颇有见地。

(四) 灾害学/灾害史。全国的如中国人民大学戴逸团队、夏明方等，成果颇多。云南灾害史研究也渐成气候，近30年来有秦剑，解明恩，刘瑜，等著《云南气象灾害总论》^[31]、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32]、李新喜《清代云南救灾机制刍探》^[33]、姚佳琳《清嘉道时期云南灾荒研究》^[34]等一批成果问世，另有大量论文发表。^[35]

(五) 经济学。经济学有深度也有思辨的魅力，很值得引起环境史研究者注意。真正的经济学

^①对上述问题的初步研究，参见文后参考文献[37]。

^②尹绍亭教授的具体成果，详见后文。

大家都不是搞数字游戏的书虫，而是针砭时弊犹如醍醐灌顶般淋漓尽致的手术刀，甚至也是引领政策的指南针。如杨小凯的《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36]，从经济学视角剖析近现代中国的发展，精彩透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成为独树一帜的显学，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大船前头鼓荡风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另如经济学家张五常以其“现代合约”和“县域竞争”理论，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的内在原因，极具启发性。问题在于，中国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恰恰也是在这一时期趋于极致的。显然，借助经济学工具进一步深入，以探求隐藏在税收分成制“合约”背后的社会密码，当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当代中国经济飞跃背后的社会公平代价、生态环境成本^{[37]498-502}。

(六) 政治学。中国社会的运行是一个权力驱动的机制，改革之后则在强政府之外，增加了另一个强大力量即资本/市场。因此，制度、政策或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生产，进而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人地关系。不了解中国政治机制，也就不可能了解中国的生态环境演变。若干研究，如卢恩来《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择》^[38]，剖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博弈及其与权力的沉湎、对于权力的操弄和对于社会利益的危害。就环境问题而论，由于公民社会的缺乏发育，这种博弈力量的不对称性是显而易见的，大众的生态环境利益的被蔑视、被损害，也成为博弈的必然结果。^{[37]510-513}

(七) 社会学。与政治学一样，社会学通过解剖个案和典型以认识社会的方法，对于认识分析社会非常有用。如费孝通关于“差序社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民族走廊”的理论，郑杭生著名的社会学“四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社会学本土论”“社会互构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李培林、李强、马戎等为代表的当代社会学中坚力量，都推出了富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吸收经济学家关于强势政府、半统制经

济及社会学家关于原子化社会的研究成果，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严重问题，可看到，一个孱弱社会同强势政府/强横资本的非对称博弈，导致严重的社会失衡，也导致人地关系的失衡：“强势政府和半统制半市场经济，对应着一个孱弱社会，进而必然对应着一个被蔑视和践踏的大自然。”^{[37]510-511}

三、肇开新天，空所依傍： 环境史料的运用与呈现

这里所谓“呈现”，指的是史料的运用，即通过一定形式（文字、图表等符号体系）以呈现自己对问题的探索。占有材料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借此认识对象的原貌、全貌，把握问题核心和症结，在既有研究和知识体系之外开出学术新天。^①原因很清楚，学术研究重在有所创获。易言之，占有材料目的是为了推进研究，在既有知识体系之外有所发明，所谓“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39]

而这需要学识、见识、胆识——仅仅充分占有材料，不见得能做出过人的研究。学识可以使人充分使用材料，得出正确自洽的结论。见识可以使人别具只眼，以人人都有材料，做出别人做不出的研究。胆识则不仅在于空所依傍，见人所未见，更在于敢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依靠充分的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进而得出正确自洽的结论，似乎简单，实则不易，往往需要优渥深厚的学识学养。

如文焕然先生在《历史时期宁夏的森林变迁》^[12]一文中针对成说指出，“现今宁夏的森林覆盖率仅2.2%（全国平均水平为12.7%），居于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之下游；加之天然林与灌丛数量少，又分布在高山峻岭之间，更给人以濯濯童山之感。难道这些可以完全归罪于大自然的‘造化’吗？”^[12]文焕然认为并非如此。他以充分

^①有了史料，尚需考订辨识以去伪存真。对此，前辈学者已有精彩的论述，这里不拟赘述。如陈垣先生在《通鉴胡注表微》的考证篇中，即比较集中地讲了考证的具体方法，包括：一、理证：即用常理判断某些史料的真伪。二、书证：即用当时的文件如诏令、法律等作为证据。三、物证：即“以新出土之金石证史，所谓物证也”。四、实地考察，等等。

的材料——包括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对“森林草原区的森林概况”“干草原和半荒漠草原的森林概况”“历史时期前期的森林变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林业概况”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宁夏虽然是个特殊少林的地区，“但宁夏自古以来并非如此。不仅南部森林、草原镶嵌布列广大地区，而且北部山地、沙荒地也分布着大面积的天然森林、灌丛、草原植被。”^[12]

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论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宁夏森林植被从“恢复”到“再遭破坏”的状况进行了讨论，以宁夏的实例对“生态环境成分的相互依存”的问题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同“开发利用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切实的思考。在“结论”中，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充分研究并顺应植被演替规律”“发展、合理利用与保护不可偏废”“统筹兼顾，因地制宜”“植被多样，优势互补”等^[12]。可以看到，文章看似平淡，但是这些看法中潜藏了对一直以来主流话语中那些甚嚣尘上的激进主义思潮——诸如“人定胜天”“战天斗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一天等于二十年”之类——的反思和超越。

有见识，别具只眼，是说学术研究还需要有相当的学术敏感性，需要独立思考，发人之所未发，见人之所未见——易言之，在别人没有看到的地方看到，在别人没有发现的时候发现，以人人都可以有的材料，做出高人一筹的研究来。

大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数十名院士曾经联合署名公开发表过一篇文章，主旨是提倡做高质量的研究，写高质量的文章，反对粗制滥造，学术泡沫。《新华文摘》曾经转载这篇文章。其中有几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大致是说：像《Nature（自然）》《Science（科学）》这样的顶级学术杂志发表的论文，即使不能说一篇顶一万篇，但说一篇顶一百篇是没有问题的。院士们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就在于，这样的文章，一是具有基础性，影响大影响深，二是具有原创性、开拓性。这样说，不是要求论文都要一篇顶一百篇、一万篇，而是强调论文应该有新意，有突破。

举一个环境史的例子——这样的例子其实不少——如王建革教授从农学生发而出的一系列论著，

将生态环境史、农业史与历史地理相结合，对内蒙古、华北、江南地区的历史生态与社会形态的关系做出系列研究。其代表作《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40-41]，描述环境与人文的关系，在选题、视角上都有出人意表的创意。

就西南生态环境史的研究而言，尹绍亭教授的生态人类学研究颇有突破性。他的相关著作如《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等^[42-43]，均来自扎实的田野调查，同时运用文化适应的观点和人类生态系统的方法进行研究，成为我国生态人类学领域重要成果。他主编或合作主编的《民族生态——从金沙江到红河》《生态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等论文集^[44-46]，围绕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和环境的变迁及其相互影响，并尝试推动生态学、植物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合作，也有不少新的开拓。

再以西部生态环境史为例。中国西部空间广阔、情况复杂，各地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可谓千差万别，其间有没有一种具普遍性、规律性的内在趋向？研究者经过长期思考，提出“同质化变迁说”，试图为清代至当代中国西部社会与环境变迁这一庞大研究对象构建一个有机的、整体性解释的理论体系。可以看到，由外力启动政治同质化（政治秩序重构），继而驱动社会生活及经济同质化（变多元经济而农业化、工业化、内地化），进而驱动大地景观同质化（自然景观变为农业、工业、城市等人化景观），最终导致生态环境巨变——这样的一个同质化变迁的过程，数百年间在从清代至当代的西部广大地区（包括了西南及西北的大多数地区）持续地上演着，至今未止。在这里，同质化变迁既是结论，同时也是关于这一复杂历史过程的分析框架或解释体系。^{[37]35-38,514-515}

胆识，除了强调识见——治史能力，如史学、史才和史识，还强调一种献身精神、英雄主义。胆识不仅在于空所依傍，见所未见，更在于敢于敢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举一个环境史以外的例子，南开大学刘泽华被选为历史系主任后，在国内主持率先开设了“文革”史、人权史、国民党史，讲正面抗日，进行

双语教学，还开设了计算机与史学研究等课。这其中若干东西明显是敏感的。他说：“当时有些人忠告我不要找麻烦，我说当系主任连开课的权力都没有，那就不如下台求清静。”^[47]在学术上，刘泽华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所谓“刘泽华学派”“王权主义反思学派”。刘泽华的一个重要学术贡献，是他在黎澍反思“文革”而写的谈“现代封建主义”的文章（1977年）启发下，形成了“王权支配社会的观点”。^[47]这个见解极为精彩，对于理解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政治，直至现当代中国文化中国政治可谓透彻而犀利^①。

再以环境保护而论，在西方强调“生态优先”不仅合法，而且代表着一种“政治正确”，著名的“绿党”即影响巨大。^②而在中国则不然，甚至有一段时期强调生态环境乃是犯忌的，甚至要冒政治风险。对此状况，曾为国家环境官员兼为著名环境专家的曲格平有很好的说明：“当一个人患了重病，自己没有觉察，反而讥笑其他患病的人，这是很可悲的。对我国环境污染和破坏的认识，也有着类似的情形。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我们颇有些自负地评论西方世界环境公害是‘不治之症’的时候，环境污染和破坏正在我国急剧地发展和蔓延着，但我们并无觉察，即或有点觉察，也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与西方的公害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按照当时极“左”路线的理论，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产生污染的，谁要说有污染，有公害，谁就是‘给社会主义抹黑’。在只准颂扬、不准批评的气候下，环境清洁优美的颂歌，吹得人们醺醺欲醉。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自然也可使人心安理得。”^[48]

直至今日，当环境保护与经济利益、与权力政绩相冲突时，环境保护往往败下阵来。探讨环境问题背后幕景的深部，往往触动社会和体制的某种敏

感之处。前述，中国社会的运行是一个政治驱动的机制，改革之后则固化为一个双强一弱的结构/机制：强政府—强市场（资本）—弱社会。因此，不了解中国政治机制，不了解中国社会结构，也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生态环境演变。同样，探讨生态环境问题，也绕不开社会结构、制度设计。在这种情况下，根究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需要研究者的胆识和担当。

譬如，如何评估当代前期30年间社会变迁的环境影响？重新定义“农业社会主义”，或许可以对这种影响从制度设计上予以一种新的解释^{[37]414}。迄今学术界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论文极多（仅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所收录已近1.8万篇），基本上系指20世纪50年代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而言。而如果从广义上来定义和审视“农业社会主义”，对这一社会运动及其生态效应则当有新的认识。可以说，从宏观上看，农业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属于民粹主义的一种理论思潮和实践运动，其表现形式是试图以传统的大同理想、平均主义去否定和超越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近30年间以政治力量驱动、以人民公社制（包括此前的高级合作社等）为基本组织形态的持续的农村社会改造和建设运动，总体上实即这样一场农业社会主义运动。这种制度设计通过对亿万“农民的权利和以地权为中心的农民的财产权”^[49]的剥夺，驱动了数十年农民与国家、农村与城市的长期博弈，造成了长期的负面的生态效应。^③

列宁曾经将俄国的民粹派称作“旧时农民社会主义”“小市民社会主义”“农奴社会主义”和“反动的社会主义”。^[50]中共理论家胡绳晚年反思极“左”主义时，认为毛泽东本人“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51]，认为从1953年以后，毛泽东就

①除论文近百篇以外，刘泽华著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九卷本《中国政治思想通史》《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国古政治思想史》《士人与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②绿党是提出保护环境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而来的政党，其提出“生态优先”、非暴力、基层民主、反核原则等政治主张，积极参政议政，开展环境保护活动，对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世界上最早的绿党是1972年成立的新西兰价值党。绿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开始在欧洲扩散，最著名的就是德国绿党（引自：360百科“绿党”，<https://baike.so.com/doc/6100222-6313332.html>，2018年5月7日）。

③关于对“农业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及对其影响的分析，参见文后参考文献[37]第414-424页。

有了民粹主义思想。^[52]胡绳的论文触及了某种敏感，从而激起轩然大波，引起了极大反弹和争论，遭到发表于《真理的追求》《中流》《中共党史研究》等刊物一批论文的密集批驳抨击，^[53-60]而同时也得到《中国社会科学》等刊载的许多论文的力挺。^[61-67]相关争论的风波，一直持续到后来很久。回头再看上述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重新定义，所指涉的不是一时一事一人，而是对于当代前30年社会运动的整体评估和重新解读，其挑战性当亦约略可知。

在研究论著中，利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体质性根源进行追寻，溯及某种敏感，对研究者的担当也是一种考验。^①

譬如，直面当代环境问题，研究者认为，“要理解中国式市场竞争的生态效应，需要进一步理解中国式市场经济的特殊路径，以及支撑这一路径的特殊的体制架构。显而易见，面对数十年来生态环境问题的空前爆发，一个十数亿人的超大社会既难以遏止于事前，也难以追论于事后，内中必有其体制的根源。”^{[37]502-503}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公司型地方政府间的空前竞争，政府由此而成为最大的资本家和利益集团。但是，政府的公司化商人化和区域竞争格局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完全意义上的市场化，而是仅形成一种市场与权力相整合的变性市场化。公司化的政府游刃有余其中，既成为游戏的参与者，又成为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裁决者。正由于此，其对市场力量的充分利用，并不妨碍其对传统官工商机制的依赖和娴熟使用：如官营、专卖、特许、干预、强制、巧取、征用，等等——这种扭曲的市场化，正是依傍于特定的体制架构的。^{[37]503}

研究者认为，这种体制架构可以概括为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即：强势政府、半统制经济与

孱弱社会。^②强势政府、半统制经济并不仅仅意味着“集中力量办大事”，它还伴随着已经凸显的种种后果：寻租活动制度基础的强化，使腐败迅速蔓延，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增长方式上的短期效应，导致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愈演愈烈。^[68]

研究者认为：社会失衡乃是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深层根源——绿色重建将基于社会重建。“孱弱社会与强势政府及强横资本恰恰互为因果：孱弱社会是强势政府及强横资本的制造物，强势政府与强横资本同样是孱弱社会的制造物。”“直面如此状况，在讨论生态环境问题时，制度设置事实上是一个很难绕开的问题。在制度上，重要的问题是监督机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其核心在于监督者也要受监督。而刚性的权力制衡、自由的信息披露和舆论监督，则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在上述诸多方面中，尤其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建立一种制度层面的合理的机制，“以遏制各种不断膨胀的政治经济因素，尤其是相互沆瀣的各层政治权力与经济豪强势势力，遏制其在小集团利益的追逐中，损害大众的和后代的生态环境利益。”^{[37]518-519,510-511}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社会的持续进步而言，很难奢望“毕其功于一役”，而往往只能聚沙成塔。因此，改良的作用或许大于革命。研究者以笔参与社会生活和社会改造，其武器除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富厚的学养以外，也需要某种学术的韧性、迂回的技巧和社会智慧，甚至还需要某种机遇乃至时代轴线的转移。

综上所述，与其他史学分支有所不同，环境史并非纯然的社会史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其本质上是人地关系史研究。除了传统史科学所注目的各种材料之外，尤其需要关切“天人之际”，关注关于自然环境的各种材料。与环境史史料相关的另一问题，是环境史的学术路向和取径。其中，向自然科

①以笔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400年来西部地区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为例，还在研究刚开始的2007年，笔者曾和学兄鲁刚教授讨论研究的时间架构。笔者的设想是将研究下限放在当代之前，以避免政治的敏感或忌讳，鲁刚则主张写到当代，认为这样更有意义。接受这个建议，拙著将研究下限一直延伸到当今。但是这样一来，增加了研究难度，也增加了结题难度。由于书中指出环境变迁与权力决策的制度设置缺陷以及政经力量相互沆瀣密切相关，被认为是“可能引起争鸣的观点”，2011年6月即送审的文稿被发回修改，直至2013年方获通过。

②这里的强势政府和半统制经济的概念，来源于经济学家吴敬琏的相关命题。参见吴敬琏、马国川：《吴敬琏：中国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同舟共进》2012年第2期）。

学、向其他社会科学的学习采借,尤其重要。仅仅充分占有材料,不见得就能做出过人的研究。在学识、见识之外,尤其需要强调的是直面社会现实的胆识。胆识不仅在于空所依傍,见前所未见,更在于敢为天下先,言人所不能言。

此外,总的说来,迄今学术界对环境史史料问题关注较少,相关研究也有待深入,令人遗憾。改变这一状况,对推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当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M]. 上海: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5: 52-80.
- [2] 荣孟源. 史料和历史科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 [3] 史念海. 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 [4] 赵珍. 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5] 方国瑜. 滇池水域的变迁 [M] // 方国瑜文集 (三).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4.
- [6] 方国瑜.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上下)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7] 于希贤. 滇池地区历史地理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1.
- [8] 蓝勇. 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9] 周琼. 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环境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 [10] 杨伟兵. 云南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 (1659—1920)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1] 马国君. 清代至民国云贵高原的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M]. 贵阳: 贵州大学出版社, 2012.
- [12] 文焕然. 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 [13] 梁方仲. 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 [14] 葛剑雄. 中国移民史 (一一六卷) [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 [15] 苍茗. 云南边地移民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 [16] 陆韧. 变迁与交融: 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7] 何炳棣. 美洲作物的引进传播及其对中国粮食生产的影响 (一、二、三) [J]. 世界农业, 1979 (4, 5, 6).
- [18] 郭松义. 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的一些问题 [M]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 清史论丛 (第七辑).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80-114.
- [19] 李中清. 清代中国西南的粮食生产 [J]. 史学集刊, 2010 (4): 72-79.
- [20] 郑维宽. 清代玉米和番薯在广西传播问题新探 [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9 (6): 114-121.
- [21] 杨庭硕. 论外来物种引入之生态后果与初衷的背离: 以“改土归流”后贵州麻山地区生态退变史为例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1 (1): 37-42.
- [22] 梁四宝, 王云爱. 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引种及其经济作用 [J]. 中国农史, 2004 (1): 51-56.
- [23] 张祥稳, 惠富平. 清代中晚期山地广种玉米之动因 [J]. 史学月刊, 2007 (10): 34-38.
- [24] 张祥稳, 惠富平. 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 [J]. 中国农史, 2006 (3): 13-16.
- [25] 郑南. 美洲原产作物的传入及其对中国社会影响问题的研究 [D]. 杭州: 浙江大学, 2009.
- [26] 蓝勇. 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 [J]. 中国农史, 2001 (4): 3-13.
- [27] 竺可桢. 物候学 [M]. 北京: 科普出版社, 1963.
- [28]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J]. 中国科学, 1973 (2): 168-189.
- [29] 杨亭硕. 人类的根基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4.
- [30] 杨亭硕. 民族、文化与生境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 [31] 秦剑, 解明恩, 刘瑜. 云南气象灾害总论 [M].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0.
- [32] 杨煜达. 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 [33] 李新喜. 清代云南救灾机制刍探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1.
- [34] 姚佳琳. 清嘉道时期云南灾荒研究 [D]. 昆明: 云南大学, 2015.
- [35] 聂选华. 近三十年来云南自然灾害史研究述评 [J]. 文山学院学报, 2017 (4): 13-20.
- [36] 杨小凯. 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EB/OL]. [2018-05-07]. <http://vdisk.weibo.com/s/z7lq334ptLFRI>.
- [37] 徐波. 近400年来中国西部社会变迁与生态环境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38] 卢恩来. 破除既得利益集团的策略选择 [J]. 文化纵横, 2014 (2): 34-44.

- [39] 陈寅恪.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M] // 陈寅恪, 陈美延. 金明馆丛稿二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 219.
- [40] 王建革. 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41] 王建革. 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 (9—20 世纪)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42] 尹绍亭. 一个充满争议的文化生态体系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
- [43] 尹绍亭. 人与森林: 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0.
- [44] 古川久雄, 尹绍亭. 民族生态: 从金沙江到红河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3.
- [45] 秋道智弥, 尹绍亭. 生态与历史: 人类学的视角 [M].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 [46] 尹绍亭. 人类学生态环境史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 [47] 陈菁霞. 刘泽华: 我是个一直有压力的人 [N]. 中华读书报, 2018-03-04 (07).
- [48] 曲格平. 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 [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89: 90.
- [49] 雷颐. 建国前后的“农业社会主义”风波 [J]. 社会科学论坛, 2009 (4): 5-20.
- [50] 王小强. 农业社会主义批判 [J]. 农业经济问题, 1980 (2): 9-20.
- [51] 胡绳.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 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 [J]. 中共党史研究, 1998 (6): 1-2.
- [52] 胡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3): 4-19.
- [53] 沙健孙. 坚持科学的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J]. 真理的追求, 1999 (3): 2-6.
- [54] 沙健孙. 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的问题 [J]. 中流, 1999 (4): 2-11.
- [55] 黄如桐. 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 [J]. 中流, 1999 (4): 21-31.
- [56] 范庠. 能够这样论证吗 [J]. 中流, 1999 (4): 8-15.
- [57] 黄如桐. 最光辉的胜利之一: 50 年代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J]. 真理的追求, 1999 (4): 8-14.
- [58] 黄如桐. 关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若干问题的讨论 [J]. 中共党史研究, 1999 (6): 85-87.
- [59] 沙健孙. 马克思主义, 还是庸俗生产力论: 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 [J]. 中流, 1999 (12): 8-13.
- [60] 彭建菁. 不能泛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 与胡绳同志商榷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0 (3): 90-91.
- [61] 何秋耕. 清澈与幽深交融: 读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5): 85-89.
- [62] 温璋平. 岂能如此曲解 [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 (5): 8-17.
- [63] 何诚. 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 [J]. 中共党史研究, 1999 (6): 77-80.
- [64] 王也扬. 也评毛泽东的“一张白纸”说 [J]. 中共党史研究, 1999 (6): 81-84.
- [65] 胡岩. 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1999 (2): 2-20.
- [66] 林蕴晖. 论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兼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1 (1): 14-22.
- [67] 林庭芳. 应当尊重胡绳教授的原意 [J]. 中共党史研究, 2001 (1): 106-109.
- [68] 张剑荆, 斯方吾. 当前中国改革最紧要的问题 吴敬琏谈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J]. 中国改革, 2011 (12): 25-32.